

新青年 DVD 手册

周 成 林 专 辑

电影龙门阵

聆听侯麦

电 影 禅



老调漫弹

电影如诗

顽童小津

冠 新世界出版社 [HTTP://MOVIE.NEWYOUTH.BEIDA-ONLINE.COM](http://movie.newyouth.beida-online.com)

精 华 版
第 四 辑



新青年 DVD 手册

周成林专辑

(精华版第四辑)

张 栋 杨海军 胡旭东 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 DVD 手册(精华版第四辑)/张栋,杨海军,胡旭东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8
ISBN 7-80187-101-4

I.新… II.①张… ②杨… ③胡… III.电影评论-世界 IV.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952 号

新青年 DVD 手册(精华版第四辑)

丛书策划:新青年 新世界

主编:张栋 杨海军 胡旭东

责任编辑:李铁 钟振奋

封面设计:点看设计顾问 鲁冰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刷:三河市长鸣印刷装订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50 千字 印张:8

印数:1-10000 册

版次: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101-4/G·044

定价:1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电影龙门阵	(1)
聆听侯麦	(12)
我与侯麦的一夜	(18)
寻找谁的小津?	(22)
艺妓浮生	(26)
黑泽明的《袅袅夕阳情》	(31)
永远的女儿,永远的贞女	(35)
活不容易,死更艰难	(40)
雷诺阿的《大幻象》	(44)
雷诺阿的诗意现实	(48)
雷伊的电影之路	(52)
灵魂的风景与电影催眠术	(58)
素朴与感伤的电影	(61)
泣血的《穆歌特》	(67)
青木瓜童话与柏林男天使	(69)
鸦雀有声的《蓝风筝》	(73)
花样年华,太太万岁!	(77)
电影禅	(83)
致醉画仙	(88)
战争片的境界	(91)
政治电影《Z》	(96)

古尔德三十二象	(99)
春宫电影人	(104)
妙人塞勒斯与《妙人奇迹》	(108)
相约战火蔓延时	(115)
幻象是另一种现实	(119)
老调漫弹	(123)
苦难中的唯美	(126)
现在流行看电影	(131)
虚拟空间性与爱	(134)
《十诫》第一诫:上帝的报复	(138)
《十诫》第五诫:非杀不足以平民愤	(143)
《十诫》第八诫:汝不可逾越那条线	(147)
电影如诗	(153)
顽童小津	(175)
醉卧与父灵同眠:小津安二郎父亲三部曲	(179)
“电影诗人”塔可夫斯基日记摘译:关于《牺牲》	(184)
“电影诗人”塔可夫斯基日记摘译:关于《圣安东尼的诱惑》	(243)

电影龙门阵

—

日剧是小儿女的鸦片，一旦沉溺就难以自拔。《美丽人生》中，常盘贵子饰演下肢瘫痪的女主角，与白马王子木村拓哉不期而遇，之后的情节都是俗套，不说也罢。倒是其中一幕勾起话题，好像是，那天，常盘贵子的轮椅停在一处天桥上，她入神地望着街上的芸芸众生。这时木村在她身旁，半蹲至轮椅的高度，说：好想从你的角度看世界。动情处往往出人意料，或者，换一种说法，潮流真是厉害。据说《美丽人生》播映期间，东京的轮椅异常好卖，因为想坐轮椅看世界的不只木村一人，还有一些恨不得自己就是常盘贵子的追风少女。

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的《Aguirre: The Wrath of God》片头，一队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和印第安奴隶正在茫茫大雾中翻越安第斯山。山势险峻，大队人马在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人物特写和长镜头交叉切换，但观众始终看不到山的全貌，只有一段段由上而下随着人物缓缓移动的山体。据赫尔佐格回忆，就此表现方式，他和男主角克劳斯·金斯基（Klaus Kinski）曾有一段争执。金斯基执意要以好莱坞风格全景俯拍，否则不足以显示人类与自然搏斗的英雄气概。但赫尔佐格坚持“以偏概全”，理由是，展现恶劣环境与人的关系，细节更有说服力。考虑到故事对人性偏执暴虐一面的深刻揭示，山行场景预示了整

部电影催眠般的宿命氛围，赫尔佐格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

传说小津安二郎的摄影师厚田雄春由于常年蹲伏在榻榻米上拍摄，不幸得了腰椎劳损。我不太相信这一传言。不过以这种方式工作，肯定不会不舒服。日人之坐，我们多视为跪，“跪”在地上，看世界的角度当然不一样——不妨将小津的角度称为“榻榻米的角度”。我喜欢小津的人物面对摄影机淡定自如的说话镜头，美丽如原节子，仁厚似笠智众，好像都是在与你面对面对话，你好比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一起坐在榻榻米上闲话家常。

在我有限的观影经验中，最让我不舒服的摄影角度是卡拉扬的角度。卡拉扬曾欢呼VHS录像带的出现为唱片业注入了生机，并一直热衷于通过影像记录来再现自己的指挥艺术。但是，看卡拉扬的指挥录像，感觉是指挥、乐手及乐器的特写镜头过分刻意。太多的镜头切换，破坏了指挥和乐队的统一，使音乐显得支离破碎。观众目不暇接于忙乱无比、肤浅表面的画面，难以集中精力聆听音乐，影像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干扰。相反，同样热衷于录音录像的钢琴天才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他晚期那张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演奏录像，摄影机的推移几乎让人感觉不出来，真正如古尔德所说：“我所做的音乐中，具有一种深秋般的沉静。如果我们使用录音（笔者注：也包括录像）能够让某种程度的完美状态保存下来，那真是一件好事。我所说的完美，不仅指技术层面，而且也包括精神层面。”

二

时代真的退步了。表面精美的东西，往往在不经意间透出骨子里的俗气。前几天看根据黑泽明剧本遗作摄制的《大雨天》，左看右看都感觉像模仿得较为高明的赝品。红光满面的男优女优套上褴褛的贫民衣衫，总让人联想起低劣的港台历史肥皂剧。现代感十足的配乐，哪里还

有《罗生门》里鼓声的古朴和神秘。记得好几年前，香港一家英语电视台播放过彩色版的《卡萨布兰卡》（原作为黑白片），看后大倒胃口，因为熟悉的男女主角一下子变成了红男绿女，犹如彩照出现之前人工涂色的伪彩色相片，艳俗得没有品位。据说该项技术（将黑白片转换成彩色片）的鼓吹者还自鸣得意，认为是一项革命性创举。幸好电影业还存有起码的审美感，否则我们今天还会看到一系列彩色版的《公民凯恩》、《魂断蓝桥》、《东京物语》等影片，简直不堪设想！

与时代退步相反，技术是真的进步了。电脑模拟的影像可以做到纤毫毕现，甚至能够伪造真实。再过一些年，恐怕真有中国观众以为阿甘实有其人，不仅与美国总统握过手，而且作为乒乓球球员来过中国。想想也实在可怕，影像其实比文字更能欺骗观众。从某种角度讲，技术的进步使这种欺骗易如反掌。

三

前几年信手翻阅过一本台湾出的翻译论著，其中一节讲到“信达雅”，举了一个大陆翻译的例子，是有关英国那位著名的铁娘子的，说是大陆将 Thatcher 一名翻译成“撒切尔”非常不雅，给人以杀气腾腾之感。我依稀记得台湾是译为“柴契尔”，虽然未必就好，但起码没有暴戾之气。中文真是奇妙，可以让人联想无穷，杜鲁福（Truffaut）可能和约翰·乔治等凡夫俗子没有什么差别，但一改为“楚浮”（而且更接近法语的发音），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文字如是，说话也不例外。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日瓦戈医生》，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别扭，因为，明明故事发生在俄国，但片中人物偏偏都不讲俄语。这部片子的毛病当然不止这点，但缺少俄国味肯定是其中之一，也难怪帕斯捷尔纳克的后人不予认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理查·伯顿（Richard Burton）和阿兰·德隆合演的《刺杀托洛茨

基)、苏菲·玛索的《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在浪费投资者的金钱。金斯利的甘地倒是说一口印度英语，可惜电影又散发出一股好莱坞史诗味。这样说并非对甘地不敬，我最近就在读《甘地自传》，深感和书相比，电影实在不算什么。

假如按照阶级论的观点，说什么语言以及用哪一种口音来讲，可能是一个关系到你究竟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重要问题。十九世纪的俄国贵族时髦讲法语；现今中国社会，望子成龙的父母巴不得小孩子在学好中国话之前就能讲英语；而保守的英国人则瞧不起美式英语，但在英国社会，上层人物和草根阶层的说话语调和遣词造句又有天壤之别。英国导演迈克·李(Mike Leigh)的《秘密与谎言》(Secrets and Lies)，姐弟俩分属中产和劳工两个阶层，电影有一段两家人聚会的场景，观众简直可以从每个人的言谈看透他们受教育和财富拥有的程度。说穿了，现代社会不仅衣冠取人，而且谈吐取人。毕竟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好几百年，举止粗野、言谈庸俗的暴发户已不多见，如果有，恐怕也被伍迪·艾伦收罗到他的《Small Time Crooks》一片中扮上一个相应的角色了。再想想，如果不是电影，罗伯特·德尼罗带有浓厚意大利口音的英语恐怕也不值得影评人津津乐道，因为现实中的黑手党，也许个个都讲这种话，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再挑剔些，大师级的导演也会犯口音错误。费里尼的《甜蜜生活》中，那位美利坚艳星就说着一口意式英语，没有一丝可信度。戈达的《筋疲力尽》，女主角号称美国记者，但一讲英语就露出马脚。在这个意义上，男主角完全有理由怀疑她是否也是个骗子。这里还想说说电影的配音，但不是针对普通话版译制片，因为很多行家已有精妙分析，我想说的是汉语电影里的方言。就个人体验，看普通话和广东话版的《花样年华》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而且，就算是粤语版，我也看过两个版本，一个是配音的，另一个是演员本人的道白。在粤语的配音版本中，梁朝伟一开口，简直成了一个油腔滑调的麻甩佬（委琐的中年男

人)。至于普通话版，那种四平八稳的念白让你根本感受不到人物细微的情感变化，就像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洋名诗，你会质疑这也算得上诗么。所以，就算真听不懂粤语，我还是建议你看原味的《花样年华》、《春光乍泄》和《香港制造》，顶多费点心思看字幕，也好过听那种千篇一律的国语配音。

世界是多元的，我不仅喜欢听到不同国家的电影讲着各自的语言，我还高兴聆听同一国度的人们说着相应的方言。在汉语电影里，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位大家让我过足了这方面的瘾。帕索里尼早期的文学创作就是采用他家乡的方言，他成名前也为电影写过方言对白。再看汉语文学，除了张爱玲以吴依软语整理的《海上花列传》，还有李劫人用成都方言写成的不朽之作《死水微澜》和《大波》，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笔下也颇多方言土语。这些都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的丰富多彩的语言表现力。

四

总感觉她是肩挑水桶走在江南的石板路上。曼妙的素衣女子笑容可掬，被汗水打湿的秀发紧贴两颊。她穿过狭窄的街道，周围是熙攘的人群和忙碌的商贩。那是黄昏，蹬三轮车的兄弟已经收工，顺道载回了在街边替路人的自行车胎加气的祖父。简陋的居室里，炉火正红，菜蔬在热锅里吱吱作响。老人坐着吸烟，与对面窗户的邻居寒暄，面容慈祥，宛如“敬爱的胡伯伯”。镜头一转，昏黄的餐馆里，卖艺人唱着素朴的小调，感叹时光流转，容颜不再。镜头缓缓移向饭桌外的角落，家中的小妹和一帮孩童在起劲地擦着一双双皮鞋，正应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越南导演陈英雄让我看了起码半个小时的好戏，甚至让我有戏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其实，反过来想一点也不奇怪，人类的很多东西都是

共通的，包括对贫困的记忆和感受。《三轮车夫》的前半段，陈英雄的叙事在平淡中传达出一种深切的人道关怀，这与影片后半段过于矫情和诡谲的故事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除了《三轮车夫》，美籍越裔导演包东尼（Tony Bui）的《恋恋三季》（Three Seasons）也是发生在今日西贡的故事，也是三轮车夫和妓女等低层人物，也同样使我戏中不知身是客，误把他乡作故乡，进而不忍指出影片的缺陷之处，因为我敬佩导演是凭一颗艺术的良心在拍戏，他有直面惨淡人生和现实的勇气。

很多年前，某位时装设计大师曾经自负地说：“潮流是什么，潮流就是少数人躲在暗室里搞搞花样，然后公之于世，让大众趋之若鹜，顶礼膜拜。”由是观之，潮流未必就是真实的。虚幻的潮流之光往往使人模糊了残酷的现实阴影。在日流韩流轮番冲击下晕头转向的人们，竟然不知道潮流的引导者正在暗处偷笑。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麻将》有一句清醒得让人害怕的台词，好像是儿子对老爸说，记得当初你告诉我骗人骗财的诀窍，就是设想其他他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需要你来为他们指明方向。说来一点也不好笑，我们今天的状况正是如此。

西方人都说东方电影让世人惊艳。我也常常惊叹，今天，纯粹的电影恐怕只有伊朗人才拍得出来了。这个国家的国情是那么的独特，但不论是《天堂的孩子》还是《樱桃的滋味》或者其它影片，总是尽可能让你看到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总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深深地打动观者的心灵。不仅东方，其它欠发达国家的电影也使我深受触动，巴西影片《九月的某四天》中，高压统治下普通民众本能般的告密行为，使观众深深感到制度对人潜移默化的同化效应。还有那位忠于职守但内心愧疚的秘密警察，那些反叛者们悲惨的结局，在导演几乎不动声色的叙事中，让观众久久不能忘怀。

今天，电影似乎有点回到它的起点状态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把电影划到娱乐（Entertainment）的类别里。但不管怎样，电影仍然是一项奇妙的艺术，它超越时空，自由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使湮没的历史复苏，让

现实存活在后人的记忆中。我相信，愿意在电影中“活着”的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娱乐。

五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早已落幕，还记得其中一个热点，就是戈达的卷土重来。这位新浪潮宿将阔别戛纳十余载，但七旬老翁宝刀未老，恰如一则新闻的标题：依旧掀起浪潮（Still Making Waves）。戈达在记者会上大肆抨击好莱坞，说美国人只会花钱买别人的历史来拍戏，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过去。他对史匹堡（Spielberg）尤其不满，特别提到后者的那部《辛德勒的名单》，质疑电影对奥斯威辛的再现方式是否妥帖，说史匹堡既然缺乏好的构思，就无权处理这样的题材。戈达还提及辛德勒九十高龄的遗孀，说虽然电影大获成功，但她并未因此得益，仍然生活困苦。至于远在美国的史匹堡如何看待戈达的言论，那则报道称，史匹堡的回应乃不置一辞。

公平地说，除了对辛德勒夫人的境遇缺乏全面了解而无法作出判断，我认为戈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辛德勒的名单》仍未摆脱好莱坞喜欢大做煽情文章的俗套，一些场景不乏刻意为之的痕迹，譬如非得添上一段纳粹军官和犹太女囚的奇情故事；非得在影片结束之前，让男主角在群众演员簇拥下，来上一大篇自我忏悔等等。这些都是多余的东西，没有它们，电影照样会打动人心，甚至更加完美。与史匹堡的电影相比，我其实更不喜欢罗贝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的《美丽人生》，我对它的评价只有一个字：tasteless。因为，我的艺术包容心再宽广，也无法接受贝尼尼对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悲惨境遇的表现方法，就像我一样不能认同以喜剧手法来再现“古拉格”（无论是哪里的“古拉格”）的苦难一样。让我们作一个假设，如果《美丽人生》是德国人所拍，就算它是“寓教于乐”，就算它是“笑中有泪”，但恐怕早已舆论大

哗，嘘声四起，更别提摘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了（个人以为，当年更有资格得奖的是伊朗影片《天堂的孩子》）。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理解，戈达的批评可能更适合贝尼尼的电影，因为，考虑到题材的高度敏感性，《美丽人生》的构思确实很不高明。凡事皆有底线，贝尼尼似乎越过了这条线，他的电影只有用“过火”二字来形容，无法达到如格拉斯《铁皮鼓》（不过原著小说又比电影好）那样的高度，所以只能发出不协调的噪声。

幸运的是，就算不满意《辛德勒的名单》挥之不去的好莱坞烙印，或是《美丽人生》带有闹剧成分的错位表现，我还可以选择另一部同类题材的片子。巧合的是，这部片子也是史匹堡的制作，只不过他仅仅担任制片人，导演则是 James Moll。这部催人泪下的电影就是《最后时光》（The Last Days），一九九八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讲述的是五个匈牙利犹太人的真实故事。他们在战争结束前被纳粹驱离家园，分别前往奥斯威辛等集中营，成为希特勒“最后解决”犹太民族疯狂行动的见证人。这五位幸存者现均在美国，他们面对摄影机，向观众讲述自己和家人的悲惨经历，或者说，摄影机跟随他们重返当年的集中营旧址，以及各自的故乡。片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出于商业考虑而编造的奇巧故事情节，甚至，幸存者的叙述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显得异常平静，但是整部片子放射出一道巨大的人性光辉，它的真实性使一切的虚构和煽情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就这种极端的个人体验而言，再高明的演员也无法表现出片中人物灵魂深处的悲恸。看完《最后时光》，我久久呆坐在椅子上，不禁怀疑起传统故事片（Feature Film）的功能来。我想起以前在哪里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一旦你干上纪录片这一行，或是仅仅看上一段时间的纪录片，你就会对其它种类的电影兴趣大减。回想我看其它几部杰出纪录片的难忘经历，至少在这一时刻，我丝毫不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

虽然这种痛苦然而可贵的观影体验一生中不会太多，但我不愿在这

里详述《最后时光》的内容，我甚至不愿看第二遍。我很欣赏一位朋友说过的话，即不论人类向善向恶，我们都得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基于此种理由，我不同意戈达对美国人的奚落。凡是人类都有责任关注自己的苦难，因为有一些痛楚是全人类的痛楚，无关历史长短，也无关内政外交，每一个人，不仅仅是艺术家，只要他愿意，都有资格去表现。至于表现得与不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六

在上一则笔记中，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像《最后时光》(The Last Days)那样的纪录片，“它的真实性使一切的虚构和煽情都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就这种极端的个人体验而言，再高明的演员也无法表现出片中人物灵魂深处的悲恸”。没想到一语成谶。文章写成后几天，我果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真人秀”，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参与演出，背景宏伟，场面壮烈，惟一可惜的，就是导演不在现场，准确地说，连导演是谁都不知道。

感谢香港两家公共电视台的中英文频道，在事发后及时且不间断地转播 CNN、ABC 和 FOX NEWS 等美国电视台的现场报道，让我及时掌握了他们那边“一面倒”的信息。我虽然不是动作片或警匪片的忠实影迷，但也惊愕于屏幕上惊天动地的场面效果。我相信好莱坞一定会从中吸取宝贵经验，把以后的灾难片拍得更精彩。不过，最让我感动的，依然是那些富于“煽情”效应的镜头，哭诉的生还者，满面尘土、精疲力竭的消防员，还有，对被劫飞机上遇难者家属的采访，他们告诉记者，自己的丈夫、爱妻或者子女从被劫的飞机上打来电话，说，“我们就快丧命，我爱你。”(“I know we're all going to die, I love you.”)我同样也被布什总统的讲话所感动，“恐怖分子的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摩天大楼的底座，但他们无法撼动美国的基石。这种行径虽然能使钢铁碎裂，但

它无法削弱美国人民坚强的意志。”（“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These acts shatter steel, but they cannot dent the steel of American resolve.”）我看到洛杉矶教堂里无数闪烁的烛光，正好应证了布什总统引用的圣经诗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shadows of death, I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的确，此时此刻，只有爱和慈悲才能安抚内心的创痛。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两座高耸入云的世贸中心大厦从曼哈顿的天空中消失了。我愿意在明年的这一天，静静地坐在家中，取出伍迪·艾伦那部黑白分明的经典《Manhattan》，在格式温《蓝色狂想曲》的乐声伴随下，细细地观看，重温它们往日的光采。

七

《Colors》是我爱读的一本意大利杂志，虽然由时装名牌贝纳通（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创办，但杂志内容殊少商业气。读者若不信，可以看看我下面列举的最近几期杂志的主题，第四十三期：养老院；第四十二期：吉普赛人；第四十一期：卢旺达和布隆迪种族仇杀的难民。《Colors》为双月刊，以图片为主，配以简洁的文字说明，有意大利文、英文、德文和克罗地亚文等多种版本。杂志不属于新闻报道和分析的类别，但注重现场感，以民间角度（类似 NGO，即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来审视地球各个角落的边缘问题，当然也包括人类共通的情感，如有关母爱、死亡和战争等方方面面。创办伊始的《Colors》不乏惊世骇俗的图片，卫道之士甚至会指责它充满血腥和暴力，但有心人只要细细阅读，就会明白编者绝非变态的猎奇者或心理阴暗的窥探狂。每一期的《Colors》都会有好几页类似电话黄页的篇幅，专门刊登各类民间机构和慈善团体的广告，让愿意献出爱心的读者免于“不得其门而入”的苦

恼。最近几期《Colors》的图片似乎减弱了视觉上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但对弱势人群的关注更加频繁，例如我前面提到的那几个主题。以我的感觉，编者的心态好像比以前平和。既然世界上有太多的暴力和恐怖，连虚拟空间也不例外，还不如老老实实地面对大众的生存困境。

写了这么多，我都怀疑究竟是在写电影，还是在替《Colors》做广告。其实，我倒是更愿意将这本杂志当作静止的DV或独立制作（Independent Film）来看。这也许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阅读体验。比方说，《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和《生活画报》（Life，现已停刊），甚至更为天真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就像好莱坞政治正确、被中产大众所接受的主流电影，充满了对自然和美好人生的赞叹，但久而久之，这些生之咏叹会使读者看不到生活的另一面。而在《Colors》这样的杂志中，你较少看到香车丽人、良辰美景之类的东西，相当一部分被采访对象都是被所谓主流社会所抛弃或遗忘的人。这些人不完全来自落后国家，他们的种族和神情虽然各异，但无数张独立的图片加在一起，构成的就是一幅人类某一群体真实的生存写照。这个群体并不完全以国家或民族划分，譬如吉普赛人就散居在多个国家，物质贫乏、心灵孤独的老人也不只是欠发达国家才有，又譬如第四十期的“垃圾”专题，采访的也是不同国家以垃圾为生的普通人。而上述这些人的处境，都是主流社会的各类媒体（包括电影在内）所不愿正视、甚至有意向大众隐瞒的。

在我眼中，DV的目的或曰功能，其实正与《Colors》相近似。今天，无论东西方，官方以及财力雄厚、惟票房是图的商业团体控制了大部分行业资源。廉价DV的出现，使有心人得到机会去记录远非廉价的社会内容。DV的影响范围可能有限，但是，它所记录的非主流但很有可能是大部分普通人的具体生存状态，至少可以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免去一些困难，使他们不用那么费力去拨开重重迷雾发掘事实的真相。笔者不是枯燥理论的朋友，不愿在此堆砌术语考验读者的耐性，只想在此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罢了。

聆听侯麦

遥想当年新浪潮诸子，伊力·侯麦（Eric Rohmer）当属大器晚成的一类。他的首部长片《狮子星座》（The Sign of Leo）拍于一九五九年，讲述一个外国艺术家在巴黎的故事。恰好就在这一年，戈达（Godard）的《筋疲力尽》（Breathless）横空出世，楚浮（Truffaut）则拍出影响深远的《四百击》（The Four Hundred Blows）。自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一九五〇年创办《电影笔记》（Cahiers du Cinema），吹响新浪潮电影的号角以来，

上述三贤已埋头苦练（看电影、写电影、说电影）近十年，方能修成彼时的第一个正果。但是，与楚浮和戈达的亮相之作比较，侯麦的处女长篇似乎有些生不逢时。或许，他还要再来个“十年磨一剑”，即到一九六九年，才能真正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是年，侯麦四十九岁，以《我与慕德的一夜》（My Night at Maud's）受到国际影评人的热烈喝彩。由

